

池塘骤雨停，归路晚风清：怀念乐黛云先生*

萧盈盈

第一次见乐先生是在2010年暮夏将尽的北京，那时汤先生还在，乐先生的腿脚也还灵便，而我，还是留法博士生。记得前夜骤雨初停，池塘中荷花依然，两位先生在北大的寓所就在这蝉鸣清涟的池塘前。

与乐老师的见面是时任北大法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的杜小真老师促成的。杜老师是将我的博士生导师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的思想引入中国学界的第一人。乐老师对于连的思想很感兴趣，想进一步了解，于是就有了这一契机。其实早在中学时代我就读过乐老师的《比较文学原理》，当时只知以国别区分文学，初见此书就像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从此才知文学还可以有这样的研究法。我后来选择来法国留学和《比较文学原理》不无关系。初见那天，乐老师比想象中更热情。近80岁的老人，还有着对世界的好奇，对未知的好学，以及一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并不局限于中华文化，而是面向全球文化。在听了我对导师于连历年著作的介绍后，乐老师立刻请我推荐他的作品，她来联系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我推荐了几本，但同时也向乐老师细述了2009年在于连与法国另一位思想家郭赛（Marcel Gauchet）之间发生的关于文明的差异性、普世性和民主人权的辩论，以及辩论所引发的种种争议。

乐老师听后沉思良久，转头问我：你怎么看？我并不讶异乐老师这突然的提问，因为这也是我自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从2006年开始在索邦攻读法国文学博士，但在第二年决定放弃，转而求学于巴

*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文艺学教授。

黎七大的于连门下，正是有感于阅读其著作给我带来的巨大思想冲击，觉得透过他关于中西两种文明的差异性研究，可以解释当下的中国。所以我完全能理解为何在法国颇受争议的于连，不但在中国被视为海外新汉学的代表，而且被归入“新儒家”而寄予无限期待。这与其说是中国学界的一厢情愿，不如说恰恰透露了当代儒学依然面临现代化转型的困境，也解释了学界为何对与汉学相关的理论如此渴求。然而，2009年于连和郭赛的那场辩论却让我反思，这凸显中西文明差异性的研究在导向对话的同时，是否也悖论地给各自的文化提供了一种原旨性“舒适区”，比如于连讨论的“意志”问题。“意志”在西方哲学中是赋予“我”之主体性的关键，却未在中国思想中被充分讨论。如果说欧洲对“自由”的思考始于“意志”，中国的道德观却从未以“自由”为基础，而是从平凡日常的生活获取意义，正因其日常，所以自带“普遍/普世性”，换言之，中国的道德观以一种自发、“顺天”的姿态出现，故此，这“普遍性”之合情合理似乎也无需论证，因其“自然而然”。这样的对比的确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的传统里没有对权力的深刻反思，但也似乎为权力大于法则（即，使政府机构得以运作的是权力而非法令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溯源性解释。虽然于连一再申明这非他研究的本意，但在事实层面上，却很难避开这悖论的反击。一直以来，儒家道德的社会性规范化（礼）和统治阶层的治理工具（法）无法真正互洽，也无法达到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制度透明化协作。单从这点来看，我觉得儒学理念难以重新成为当代道德准则的基础，解决我们的社会和人生问题（退一步说，这目标在政体与儒家理论深度绑定的时代尚不能达成，在儒学与政治制度分离的今天如何能实现？）。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国人一直尝试寻求答案而又求而不得的老问题，当然也是于连和郭赛关于文明差异性争论中的实质。

在回答乐老师的问题时，我很有些不管不顾，明知乐老师的先生汤一介是当代儒学大家，明知他们是罕见的伉俪情深，我心中却像压

着沉积多年的块垒，只想一吐而快，当然也带着那所谓的“年少”傲气。没想到我还没说完，乐老师就已很激动，朝着另一个屋子喊：“老汤快来！”汤先生比乐老师高大很多，行动却更便捷，他很快从另一房间走出，来到客厅，坐在乐老师旁边。乐老师两眼亮晶晶地向汤老师介绍我，并让我复述刚才的回答。面对汤老师，我突然底气全无，刚刚口若悬河的劲儿也不知到哪儿去了，却也只能硬着头皮再说一遍。如今再追忆，已全然忘记汤老师是如何回应我的，只记得汤老师和我之间的“二人论”最后变成乐老师也加入的“三人论”，而乐老师明显是“站”我这边的。

那是个很欢快的上午，两位敏慧洞察的前辈遇到了一个头上长角的晚辈，欣然接谈，非但不愠，反倒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大概是他们见惯了恭敬有礼的学生后辈，看到我这样什么都敢说的，新奇之外也觉畅快。而我则完全没有想到初次见面的乐老师会帮着我反对汤老师的观点，这多少有些颠覆我对国内乐老师那一代女性学者的想象。自此之后，我们就有了很多邮件和电话联系。乐老师常问我：有没有什么未翻译的法国当代优秀学者著作可以推荐？有什么新的文坛动向？关于某些事件和观点，法国学界有什么评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在多大程度上受了传统影响？如何解释他们的激进观点？我本是散漫的人，从没有制定过什么系统的学习计划，看书由着自己的兴趣来，并不限于文学和哲学。想要回答乐老师的这些问题，就不得不对法国文学史和思想史做系统梳理，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我的博士论文写作。我后来常常想，乐老师是不是看出了我不合时宜的“博览”，以这种方式助我完成论文。在这四年里，乐老师向我约了好几篇稿子，其中有一篇在未出版前引发过争议，有人认为涉及敏感话题。但乐老师坚持要发表，并说：如果这篇不能发，那么这期就不发了。这是我毕业回国后才知道的。也是在这四年里，乐老师向《跨文化对话》副主编、法国阿尔多瓦大学教授金丝燕老师推荐了我。依然记得第一次和金老师在巴黎见面时，金老师说，乐老师嘱我来考察你，同

时也嘱我要对你提供帮助。这让我觉得自己像是在接受考验，但同时又觉得心底暖暖的，有很幸福的感觉。

四年后，我完成博士论文回国，再见已失挚爱（汤老师在2014年去世）的乐老师，她似乎已经从哀痛中走出，还提议到北大里面的资源宾馆吃饭庆祝我博士毕业。席间乐老师一次都没有提到汤老师。餐毕，乐老师拿出一部那年最新版的苹果手机，说：“这是老汤走时嘱人买来给我的，是他最后留给我的礼物，他希望我能好好使用新技术。”我突然想到，2010年我去拜见两位先生时，随身使用的正是一部苹果手机，当时手机从包中滑出，汤老师还问了我一些手机性能和运行的问题（苹果手机在2009年才开始进入中国），可能那时他就意识到智能手机将带给世界巨大改变。临走前，他送乐老师手机，推动她融入这场巨变，可见在汤老师的心中，乐老师永远是生机勃勃的，永远能够抓住时代的脉搏。而事实也正是如此，重新振作的乐老师依然像年轻人一样工作，依然对各种事情充满好奇，依然无成见地去理解这巨变中的世界。

回国后，乐老师立即荐我加入《跨文化对话》编辑部。因此我虽不在北京工作，但与乐老师有很多见面机会。乐老师广博而细致，洞察而敏锐，反应迅捷，精力旺盛，我与她交流从没有过代沟感。我在乐老师面前从未恭恭敬敬执学生礼，因知她并不喜如此，更多的时候，我们像忘年交一般对话。记忆中，乐老师并不是只对我这么亲切，她对学生晚辈几乎都有这么一种平等的态度，而且不遗余力帮助年轻学者，热情洋溢地对他们寄予学术上的期待。

从2015年到2017年乐老师出事故前，我们有过多次长谈。有时聊到饭点，乐老师干脆留饭，大多时候是咸鸭蛋配白米粥：这很像我南方故乡的夏日晚餐，难耐的暑热之后，最为开胃的一碗粥和咸味配菜。在那些长谈中，我们不仅聊学术，也聊各自对生活的观察，尤其是身为女性在社会中的权利和责任。乐老师曾不止一次向我感慨当代女性的自我意识较之她年轻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反像退步，

女性越来越沉默，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将嫁个好老公看得比自身奋斗还重要。记得有一次，乐老师谈到这里，突然说：“我隔壁新搬来一位物理教授，也是从海外引进，和你年纪相差不大，介绍给你好吗？”我瞪眼望着乐老师，又忍不住笑了：“乐老师，急转弯太快，车尾灯打到我脸啦！”乐老师马上回说：“不勉强，不勉强，哈哈。”现在想来，乐老师真是把我看作家人一般，才会突然想到就脱口而出，完全忘记自己刚刚对女性急觅金龟婿的批评。但在批评当代女性自我意识消退的同时，乐老师也认为，这或许只是暂时的，转折会很快来到。我也有同感，因为观察到很多女性压抑的无声愤怒，那些沉默更像是爆发前的力量积聚。2018年开始的各种女性运动验证了我们的猜测，只是我们再没有机会面对面聊这个话题。经历过2017年摔跤断骨事故的乐老师，身体状况已急转直下，任何超过半小时的谈话都会让她觉得疲惫。

2017年前的乐老师一直是说干就干的行动派。我回国工作时她已年逾八十，还有各种想法想要实施，比如讨论新科技和文学哲学之间的关系，比如推动中法学术之间的合作和对话。对我的很多想法，她鼓励我“放手去做”，她会给予我一切她能给的支持。只是，在所有的计划还未开始时，意外就已到来。2017年乐老师出了事故，同年我父亲骤然离世。我沉寂了两年。那两年里，虽被邀请到法国巴黎高师的跨文化中心（Labex TransferS）做客座教授，也在南京组织了一次国际会议，但没有做过任何学术研究，那两年里所有的论文发表都是2017年前的旧稿。那是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永远失去”，而且是完全在预料之外的失去。先前深感确定性的生活就这样在自己眼前变得无意义，而这时，学术当然无法回答我虚无的质疑。那两年里，我和乐老师的交流越来越少，我们都陷在自己的困境里。对乐老师而言，是身体的，对我而言，是精神的。两年后，在我们终于缓过劲儿来的2019年底，疫情来了。这一次，我们都没有想到疫情持续的时长，更没有想到，以往4小时内就能到的北京，在健康宝的弹窗中成了无法抵达的首都。

翻看手机里2019年后和乐老师的微信对话，好像是一种无限的循环重复：我说要来北京，乐老师说“等你来”，然后我解释为什么来不了；过阵子，我再说要来北京，乐老师回答说“你来”，然后依然是我的抱歉和解释；再一次，又说要来北京，乐老师回答说“来”，最终还是抱歉和解释。在一次次的重复中，我们的话越来越短，到最后重新陷于沉默。

刚回国时，乐老师曾问过我为什么选南京而不是北京，为什么选师范大学。我依然记得自己当年意气风发又不免天真的回答：因为南京不是那么“名利场”，师范大学的学生以后大多会成为老师，我希望用我的课来影响学生，以后学生还会再影响他们的学生，我希望能做一些改变。我还记得乐老师回答说“你不在北京，就太不方便了”，但眼里却有着满满的赞许。在之后的很多年里，在经历挫败、每每想嘲笑自己的“蠢真”时，总会想起乐老师的这个眼神。对我来说，这眼神是一道光，是一种力量，并不会随着乐老师的逝去而失去。

坐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敲打以上的文字，突然泪目。好在我位置的对面是木头半墙，抬头还能看见远远的天空，以及中庭松树的枝丫。那些朝着天空无限延展的树枝是对虚无的回答吧。

2024年10月23日

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BNF）